



三谈骂人

因为忽然想到一个“我要骂人”的题目,以补“枉担个虚名儿”之憾,又想起鲁迅有过一篇《我要骗人》,翻出来看,发现这位浙东乡先贤其实是虽有“骗人”之志,却无骗人的本领,通篇说的是真话与实情,毫不忌讳。尽管这篇应约为日本刊物写的文章,发表时文中“上海”、“死尸”、“俘虏”等词和指日本国旗的“太阳的圆圈”一语都被删去,还是看得出对“中日亲善”和国是世情的愤懑的。即如“中国的人民,是常用自己的血,去洗权力者的手,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”。这真是用血凝成的沉痛的经验,也是“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预感”吧。

鲁迅文中又说,“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,问我天国是否真有,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,答道真有的吧”,此时已是1936年2月,上距写作《祝福》的1924年2月,整整一纪,祥林嫂关于人死后是否有灵魂的提问,仍然萦绕于鲁迅的心。鲁迅以捐款一块钱,“骗”得了为水灾灾民募捐的天真孩子的欢喜,又深感为不愿意看失望的样子而骗她是不应该的,因为鲁迅不相信款子会真的到灾民手里,“想写一封公开信,说明自己的本心,去消释误解,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,于是中止了”。鲁迅也终归不会骗人。

骗人:有些人是得心应手、心安理得的,但对只惯讲真话的人来说,就是个难题。

骂人,也不容易。

以子侄辈写前国民党将领们的史实的黄济人,在《三访黄维》中说到他请黄维去过日原稿的情形:

“黄伯伯,我在纸头上骂你了……”
“骂我?你没有骂我。”黄维从一种漠然的情态中回过神来,反而朝我笑了笑,“你写的事情是真的,就不叫骂。就算真骂了,也是该活骂的……”

读到这里,我不禁对黄维其人在这里表现的明达和气度油然产生几分敬意:在涉及个人的史实面前能持这样冷静态度,不失为有识之士。

深圳、香港、上海、台北有个四城市文化论坛的组织,一年一会,至今已超过了10年。

这四个城市各有特色,可算是相当异质。有一年的会议主题是“城市的传统”,各城市就主题各提供一段纪录影片。纪录片显示了各城市自我认知的差异。香港文化人有极高的国际化水准,但1997年后香港显然出现了认同危机。它的纪录片还有强烈的后现代犬儒风格。台北则是传统复杂,但近年的台湾却少了鲜明的自我定位,遂只能将它的复杂传统对文化生活的影响,以平实的方式呈现;它很亲切宜人,但换个角度言,它在平实中却也有某种精神性的平庸之感。而至于上海,它成了中国的头号样板都市,遂难免多少有点自大浮夸。最独特的乃是深圳,它历史传统短浅,没有什么可以自吹自擂的成分,只能表现它很平常的生活方式,有小小的自傲,有平凡的上进。这个没什么传统的移民城市,因为没有传统的负担,反而轻松自在,步履也才走得更快。那次谈传统的会议,其他城市在那里侃侃而谈,深圳的朋友反而是怯怯的有点过分的谦卑。我就指出,传统的重量有时反而是负担,深圳的幸运可能就是它少了许多有传统就会有的壮烈、悲怆、缅怀、傲作与守旧。这反而使深圳多出了平淡、务实、上进的风格。

我近年读书,愈来愈有一种独特的认知。我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少数几个生长点,它不可能是中心城市,因为中心城市有太多力量会相互抵消;也不可能太过偏僻,各种力量都不足;一定要地点适宜,才可人文荟萃。我这个观念是来自近年读启蒙运动的启发。

近代人类最大的成就乃是启蒙运动、浪漫主义和工业革命,而带动这波发展的不是欧洲既有的那些中心城市,而是相当边陲后进的苏格兰。苏格兰在文艺复兴时还是极落后的地区,但从18世纪起却快速发展,成了带动变化的新中心。我的理解是:

第一, 苏格兰人重视识字及阅读,并养成对知识充满好奇心的欲望。苏格兰的不同从阅读开始。

第二,我们研究苏格兰的启蒙,当可发现它那时的哲学、神学、文学都有一个最大的特色,那就是朴素。朴素是知识不离常识,有一种经验的整体性特质。如果我们回头去读启蒙时代的主要著作,就会发现他们谈问题比较实在,没有东拉西扯的玄学腔,也不太会咬文嚼字,甚至那时的文学也很朴实。易言之,就是那个时代的风采已符合了理性及科学的原理原则,没有虚骄的色彩,这种理性态度自然而然地符合了后来所谓的“现代性”。难怪启蒙时代令各类知识会快速发展,科学技术也突飞猛进了。

正因对理性启蒙那个时代极为尊敬,我对那个时代的朴素风格还很喜欢。朴素是一种单纯,单纯地讲理,单纯地上进,正因单纯,才不会浮夸,才会务实,才会进步。中国若要进步,就必须发扬朴素的力量。我一向认为,将来的中国南方一定会在中国的发展上扮演重要角色,我对深圳即有这样的期待。

因此,当读到王京生这本《真理是朴素的》

书香中国专刊

柔日读史(节选)

□邵燕祥

以黄维的简洁的定义相绳,要骂人,除了不讲道理以外,还须不顾事实。如此看来,骂人,也不容易。“我要骂人”,只好作罢。

本想把这个从想要骂人而又撤销原议的过程如实写出,也还是“吟罢低眉无写处”。好在前两年先后有过《骂与非骂》《颂和骂》两篇短文有所阐明,倒好像是一种“预感”了,然而一切预感也无非源于经验吧。

1989年9月3日

呜呼!冷漠、苟安与自欺

翻检故纸,抖落一页,抄着鲁迅《题未定草》中一段话:

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,对于人生,既惮扰攘,又怕离去,懒于求生,又不乐死,实又太板,寂绝又太空,疲倦得要休息,而休息又太凄凉,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。于是“曲终人不见”之外,如“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”或“笙歌归院落,灯火下楼台”之类,就往往为人所称道。

是一个年轻的朋友所抄,并说“那天您谈到‘隐居’的冷清,参照这些话,或可一笑”,日期署元月31日。不可能是前年,也不像今年,那么是1988年元月了。然当时怎么说起“隐”来,已全忘却。

我倒想起周作人谈过:“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,他有一肚子理想,却看得社会浑浊,无可实施,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,不再来多管。”

周作人或是夫子自道吧,他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营垒退出来,一来二去,终于“大隐隐于朝”了。他的血液中,原说是有叛徒精神和隐逸精神参半的,末了只剩下加了引号的隐逸精神。

为什么加了引号呢?因为就周作人来说,他确实看透了“社会”的“浑浊”,这种唯我独清的心理导致除了自己以外对一切的彻骨的冷漠,而无能为力的心里又导致了置一切是非于度外的苟安。

最后使周作人“下海”的就是这冷漠和苟安。近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辱升沉中,暴露了许多人精神上往往不能排拒这种病态,虽然这病不是直接得之于周作人,也没有尽像周作人那样病人膏肓。

因此,研究周作人,看透他的病在冷漠和苟安,在今天也绝不是全无意义的。每当我自认为面对着各种“浑浊”的世相而又深受无力感的压迫时,常常冒出掉头不顾的念头,其实这种知识分子的心理病,也正是社会病的一部分,由社会病所造成,又助长了社会病,只是我们自以为明察秋毫地分析社会病的时候,往往忘记了还顾自身。从高频阔论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”,到随波逐流,以至同流合污,正是这样日就之下。以我们的苟安,指责周作人的“下海”,即使不是五十步笑百步,怕也是三十步笑百步吧。

苟安非久安,苟全性命于乱世也罢,苟全性命于治世也罢,在自欺中生存,复将在自欺中死灭。

自欺、自慰、自在于苟安中,我们,自称中国知识分子者,将不配有更好的命运。

1989年12月1日

(摘自《柔日读史》,邵燕祥著,作家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)

真理是朴素的(节选)

□王京生

四月,我们看海去

四月,我们看海去。
夏天说早了,春天说迟了,然而,我们选择四月。

是的,报春的花朵将于四月纷纷从枝头坠落。是的,夏天才刚刚露头,还热得不够气氛,海滩也许是孤寂的,然而,我们选择四月。

因为,四月是变化的季节。
默默的春潮开始鼓动初夏的浪花,强大的暖流正铺天盖地砸向礁石,涌入海滩,春叶的幼稚转入夏的成熟,春的播种滋生着夏的繁荣。

我们喜欢这热闹前的寂寞,我们喜欢这幼稚向成熟的变化,我们看海去!

不必等到滚滚人流都涌向海滩你再去观海,海的壮阔,不取决于岸边的喧闹;不必叹息你没有跟上春的脚步,四月的海是大自然的第二个春天,你在这个时候看海去,你便是别一种意义上的红梅。看海去,我们看海去,看变化的海,早已是不早,但,迟也不迟!

抓住人生中的四月吧,将悲春的叹息留给残花,走向大海,迎接丰实的五月六月。

不管天何时,四月,我们看海去!

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步

有一个生长在穷乡僻壤的青年,一直被村上的老人们赞扬。他像这些人一样,老老实实种地、老老实实吃饭、老老实实睡觉,举止言行与他的淳朴父辈如出一辙,于是他被他们宠爱,一致认为他有出息。

但是,这个青年在某一天突然醒悟:我被他们赞扬,仅仅因为我同他们一样,这意味着我将像他们那样度过一生,我和这个地方都将终生贫穷。从那一天开始,这个青年有了新的生活态度,他宁可受到指责,而不愿听到赞扬。他做了许多那些村民无法理解的事情。直至有一天他被认为无可救药而离开家乡。

他今天是深圳十大青年企业家之一。当他把那个村庄的很多年轻人带到这个城市,让他们将工资源源不断汇往家乡时,曾经斥责他的人沉默了。当他把家乡一所学校建成并主持开学典礼时,他对孩子和家乡的父老说了这样一句话:

“我的成功仅仅是因为我敢于拒绝和丢弃那些真挚的赞赏,而选择误解。”

在有记载的人类史上,被误解的事情还少吗?博大精深的孔子至死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人物。当布鲁诺主张人们拥有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时,他遭到所有教徒的唾骂,被处以极刑。还有毕达哥拉斯、苏格拉底、耶稣、路德、哥白尼、牛顿……

庄稼地审视那些高贵的头颅吧,欣赏他们面对流俗和误解时所发出的微笑和坚毅的神色!

玛格丽特·撒切尔回忆说:小时候,每当她问父母,为什么不可以一味模仿别人时,父母总是告诫她,跟在别人后面是一种怯懦,要做自己

邵燕祥是个80多岁的老者,虽然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他,但这并不妨碍他照样是中国的一位知名的诗人、杂文家。耽误他被家喻户晓的,是他不善招摇的“毛病”。大众传媒上基本找不到他的影子,是因为他与这类传媒本来就互不需要。他不到大学去讲学,是因为他与今天的大学大致上也是互不需要的。就此,邵燕祥可算个很不与时俱进的人物。他在一部分人中的“很著名”,全是因为他的文字,而且不是那种一本书就能卖上几十万册的文字,就此,他又是个生不逢时的人物。喜欢他文字的人,会认为他是个很牛很牛的人,没读过他文字的年轻人,干脆就不知他为何许人也。但是我觉得善思想、喜文学的年轻人若是不来认识一下邵燕祥,总还是难免有些遗憾。

邵先生跟我说他属于少量的老读者,让我别费这个精力再向年轻人介绍他了,他更没有“开拓图书市场”的雄心。然而我却不甘心那种人喜欢他却不认识他的年轻人与之擦肩而过。

我觉得,思想文化领域中货真价实的好东西是不大会过时的;老头儿中的好老头儿也是应该被年轻人了解、记住的,况且好老头儿骨子里也大都不会彻底老化的。他们的老,往往表现在时尚方面和语境方面的不够时髦,其思想观念,往往比忙忙叨叨的年轻人和堂而皇之的中年学者们更年轻。这种年轻,是他们历尽一生磨难、几经涅槃后的“新”,是古树残株上面的新枝艳花。这绿叶红花,在遍体鳞伤、伟岸沧桑的枝干的映衬下,散发着来自灵魂的香气。远看,悦目神移;近前闻一闻,则令人的精神心旷神怡香弥漫。

老与少,自然有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之别。前者,不可抗拒;后者,大可为人。就此,邵燕祥的好友张思之更为典型。玩笑间,我们甚至会出言不逊说他为老不“尊”。事实上这些老先生不但告诉了我们什么叫“赤子之心”,还让我立志将来也要活成个为老不“尊”的样子给这个世界看。我觉得,中国的古往今来,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,不管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,“尊”,都是个挺丑的姿态——像个阴森森的庙堂里会杀人的泥胎。

大概是10多年前,我才正式注意到邵燕祥。因为摄影家李晓斌(《上访者》的拍摄者)说邵燕祥是他心目中的“当代鲁迅”。我想这个“帽子”也太邪乎了吧!中国当代哪有什么鲁迅啊!然而这四个字还是刺激了我,因为我很在乎鲁迅,又因为李晓斌本是个“谁都不上”的人。

张思之与邵燕祥这对老朋友,多年保持着激烈的“好人坏人之争”,以至张提到邵时,常常以“那个坏人”代替邵的名字。邵燕祥“搭桥”手术后的一次聚会,大家数落着身边的老哥们儿死的死、病的病,他们之中的“小字辈儿”都仲兵蹙着眉头、不无一丝凄凉地感慨:“你们看,如今怎么总是好人得病啊!”邵燕祥则



王京生的这本短文集,文章虽然都不长,但都有可以延伸的空间。真善美是一种对真理、公共之善以及综合美感的信念;真善美是一个整体,它会让人形成一种生命的原生性动力。

真理之所以是朴素的,乃是因为人朴素。朴素是一种单纯,单纯地讲理,单纯地上进,正因单纯,才不会浮夸,才会务实,才会进步。中国若要进步,就必须发扬朴素的力量。朴素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与质感,没有雕琢,自然实在,这种文章反而难写。王京生的文章虽短,但都有朴素的特性,而这正是当代及未来中国最需要的品质。

认为正确的事情。这些教诲培养了撒切尔铁一般的意志,她自豪地宣告:“如果一个人有信仰和想做有意义的工作,他就会遭到意见相左的人的反对,我的人生就是不断与这些人斗争的过程。”

朋友,新鲜活泼的生命是不允许在随波逐流中被浅薄地消耗掉的。每个人都应该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步。在议论和误解面前,每个人都应该轻轻而又坚定地:“我有勇气。”

移民

深圳是移民的城市。

在深圳夏日的骄阳下,红红绿绿忙忙碌碌川流不息的是年轻的移民。

人们都说,移民是在寻找外面的精彩世界,深圳的世界比较精彩、诱惑多;我说,真正的移民是在寻找自己,看自己怎样的大脑,怎样的身躯,怎样的力量。

人们说,移民最现实,因为深圳是个务实的地方;我说,真正的移民是梦想的产物,梦想着第二天的清晨,海水更加平静,天空更加湛蓝,托出一轮更加柔和艳丽的太阳。为了梦想,移民不惜舍弃过去的平淡和安宁、过去的荣光。

移民的实质是把期待变为行动!

跟年轻人说说邵燕祥

□窦海军

低声细语、悠悠地说:哦?思之的身体不是很好吗?大家频频点头,都觉得郑仲兵的话有绝对。不想张思之立即拍案斥斥:“坏!真坏,你们看清谁是坏人了吧!”大家这才恍然大悟。原来邵燕祥这话是顺着郑仲兵的逻辑说的,意思是“张思之不得病,所以他不是好人”。后来的一段时间,我们就以“不得病的人”来称呼张思之,以此来暗示他是个坏人。其实这也正是邵燕祥的文风——总是骂人,却找不到一个脏字。事实上张思之和邵燕祥都是很坏很坏的人,只是坏的表现风格不同。张,锋芒毕露、拍案而起;邵,绵里藏针、不动声色。这种嚣张与温顺的差异,导致了不同阵营的人们很激烈地喜欢张或讨厌张,却较温和地喜欢邵或讨厌邵。

去年的一次聚会,我接送退休教授钱理群。车上聊天,他说不再给年轻人讲课了,因为很多优秀年轻人不解世事,若接受了自己的观点,担心会害了他们。到了饭桌上,邵燕祥又不约而同地发表了类似的观点:“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历史时期,会牺牲大量的人做铺路石的,就此他不忍心看到一些优秀的青年懵懵懂懂地做了这种铺路石。”年轻人尽可以不了解,不喜欢这些老头儿,但他们却设身处地地惦记着年轻人。

又一次聚会上,大家提起邵燕祥很早以前发表于《中国青年报》上的一篇短文曾从灵魂深处解剖了毛泽东的早年诗作。

在日记本上我竟然找到了这一小片剪报,是1988年5月5日的报,题目是《评毛泽东的〈咏蛙〉诗》。没想到的是,20多年后我重读此文,竟与当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。

邵燕祥20年前就说过:“‘劫富济贫’是历来流氓无产者的口号。流氓有产者呢?他们的行动则是‘劫贫济富’。”与这个观点的深刻性相比,今天我更惊叹它的预见性。而短文《评毛泽东的〈咏蛙〉诗》,我今天才有能力读懂它的深刻性和预见性。邵在剖析毛的这首诗时写道:

……通观全诗,都与救国救民无关。诗中所透露的“抱负和志愿”,恰恰使人想到屡试不第后来领导农民起义的黄巢(咏菊):“我花开来百花杀!”这是一种必欲凌驾群伦、唯我独尊的“抱负和志愿”。其诗格与黄巢、朱文谦相伯仲,不用说与富于民主性精华的古典诗歌优秀之作相比,即使置之于帝王诗之间,也远在刘邦《大风歌》之下,思想上、艺术上都不足取的。

此文完成后的一年就来到了1989年,而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柔日读史》所收录的,便是邵老从这一年开始写作的“读史杂记”。我想,今天的年轻人若是外国的麦当劳、中国的麻辣烫吃得有点腻烦了,不妨回过头来也品一品邵燕祥煲制的这碗中国汤,说不定会有些“别有滋味在心头”的感觉。

至于邵燕祥这一时期具体的所思所想,有书在,就无需我多言了。

有人说,移民都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,深圳为每个灵魂提供了可以吟诵的舞台;我说,移民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安定,为了安定,移民过去和现在都在默默地流淌汗水,安定下来的移民,刚刚流入的移民汇成的是一个愈来愈嘹亮的大合唱。

移民汇聚,像小溪入河;
移民涌动,像春潮破冰。
移民们含着泪水,又裹着志气,内心充满着焦灼、希冀,又步履镇定,时时感觉贫乏又时时充实,否定着又建设着,寻找着也获得着,思想着也行动着。

近看,是一个个或者热情、或者冷漠、或者彷徨、或者坚毅、或者精明、或者布满欲望的面孔,远看则是发育着的长满肌肉的大山。

移民,年轻的移民;蓬勃的充满不可遏止追求的困难的正在踩出道路的移民,向一切欣赏嘲弄困惑苟且的目光,作出无愧无悔的证明!

每一个明天都是机遇

每一个明天都是机遇。认识这一点使我们快乐。

蓓蕾将在明天怒放,风暴将在明天平息,雏鸟将在明天破壳,远行的人将在明天上路。就在明天,树木、群兽、海洋、土壤——天地万物完成了新的伟大释放和孕育,创造出无数的形态各异的生命。

不仅如此,随着残夜消退黎明来临,厄运成为转机,难题有了答案,沮丧让位于勇气,这是对明天抱有信心而在今天付出汗水的人终将得到的报偿。

很难想象一个对明天心存恐惧的人,能够在今天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。正是这样,明天使我们之中的勇敢者面带微笑征服困境,身心俱疲而永不言悔,告别故乡而宁可选择动荡无助的生活,取得成功后又开始新的创造。有人曾经问福克纳:你为什么能够不断将烦恼抛却,那样乐观地对待人生并取得巨大成就?回答是:“我永远直视明天。”

永远直视明天!

人类不屈不挠的力量源于不断创造机遇的雄心和对明天的信赖,它使我们这个星球声音嘈杂而又生机勃勃,使追求与幸福永恒地交替出现。

感谢昨天的馈赠,正视今天的现实,但我们永远对明天无限关爱。生活不断地提醒着:沉湎过去只会在悔恨或虚荣中煎熬;过分看重眼前,可能长久挣扎在名缰利锁之中。浩荡的永不回头的江河,笔直的不断向蓝天靠近的白杨,都启示着全力以赴奔向未来的精神。

每一个明天都是机遇,这是一种生活态度,是青春独有的宣言。它显示着血脉贲张的青春力量和把握未来的信心。它是勇敢者不断超越自我所表达的观点。怯懦的人,患得患失的人,暮气沉沉的人,哪来的此等人生之豪迈与意境。

于是我们理解了泰戈尔那美丽的诗的语言:“黎明,那是世界的希冀、慰藉,白昼的礼赞,每日开启东方金碧的门户。”

这就是明天的魅力,充满机遇的明天的启示。

(《真理是朴素的》,王京生著,作家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)